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建设工程丛书·中华民国史学科

一九三〇年代的中国

China in 1930's

(上 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九三〇年代的中国(上、下卷)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9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建设工程丛书·中华民国史学科)

ISBN 7 - 80230 - 213 - 7

I. 一... II. ①中... ②四... III. 中国 - 现代史 - 文集 IV. K260.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0021 号

·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建设工程丛书 · 中华民国史学科 ·
一九三〇年代的中国

编 者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65269967
责任部门 / 编辑中心 (010) 65232637
电子信箱 / ssdphzh_cn@sohu.com
项目经理 / 杨 群
责任编辑 / 杨 群 李 妍
责任印制 / 盖永东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市场部 (010) 65285539
法律顾问 /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毫米 1/16 开
印 张 / 56.25
字 数 / 925 千字
版 次 /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 - 80230 - 213 - 7/K · 020
定 价 / 120.00 元 (上、下卷)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前 言

继 2004 年 7 月在宁夏银川市成功召开了“1920 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2005 年 8 月 4 日至 8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历史研究》编辑部、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四川成都市联合主办“1930 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我们规划召开的民国历史系列研讨会之第二次，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台湾、韩国、日本、美国的 60 余名学者出席了此次会议，并提交了 57 篇论文。本书就是此次会议的论文结集。

有关我们规划举办以 20 世纪上半叶若干“年代”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的由来、设想及其意义，已见诸 2005 年出版的《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国》前言，此处不赘。至于 1930 年代在 20 世纪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向为学者所重视。以 1937 年爆发的抗日战争为分界，1930 年代的前半期，中国的贫弱地位虽无根本改观，外来侵略与国内内战依然并存，但国家正在逐步走向统一、经济文化持续有所发展、社会整合有了一定的进展，总体而言，国家发展与现代化转型表现为上升的过程；而日本侵华战争则打断了这种发展的势头，国家领土被分裂，经济体系被打乱，民众颠沛流离，社会秩序失范，严重影响了中国的正常发展。但是，也正是因为抗战的爆发，在更广大的空间与更长期的时间，造成了中国社会更大的变化，民族主义得以高度张扬，普通民众对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认同度得以大大提高，民主政治理念的传扬，现代经济、文化、教育向内地的扩散，在影响着当时以及其后中国的发展历程。当我们时时铭记战争给中国造成惨重损失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战争为中国发展带来的新因素，并研究这些新因素所造成中国的新变化。同时，就许多基本的方面而言，纵观 1930 年代的中国，无论在战前还是战中，历史的发展自有其脉络，未必因战争而截然分隔，对于其间之传承流变，我们自应予以应有的重视。收入本论文集的论文，内容涉及 1930 年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

社会等各个方面，展示了学者对其时中国历史的研究兴趣与个人思考，可以为我们深入了解与认识民国历史提供借鉴，并可为后来者进一步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对与会学者惠允将提交会议的论文修改后收入论文集，我们谨致衷心的感谢。这些论文均为各位作者精深研究之结晶，观点与方法容有不同，正可体现百家争鸣之风范。其中部分论文因篇幅过长，而论文集实难尽容，我们在编辑时作了仅涉文字的技术性删节，并因时间所限，未及征求所有作者的意见，如有不适之处，概由编者负责，并请作者见谅。

民国史学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点学科，此次会议的召开，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工程的经费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国际合作局和近代史研究所的领导、近代史研究所科研处、《历史研究》编辑部均对此次会议予以很多支持。我们在此谨表感谢。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与我们有良好的合作关系。此次会议在成都市举办，承四川师范大学的领导大力支持，历史文化学院承担会议的组织及会务工作，对会议的圆满召开贡献良多，并得与会学者之一致好评。其后，他们又对于论文集的编辑出版工作予以支持。我们在此对他们的贡献特别表示衷心的感谢。

此次会议论文集的出版，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支持。民国史研究室赵利栋、罗敏、张静等承担了论文集的初期编辑工作，《历史研究》编辑部张永攀承担了诸多前期工作。对他们为本论文集编辑出版所作的贡献，我们亦表示衷心的感谢。

“193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及论文集的出版，是民国史研究室邀集海内外学界同仁，以“年代”为论域，专题研究民国历史的系列之一。我们当继续努力，完成此项系列专题研究，以期以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更多地贡献于民国史研究学界。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

2006年7月18日

上 卷

一 一九三〇年代的中国政治

论蒋介石第二次下野与再起	金以林 / 3
蒋介石与“约法之争”	陈红民 / 19
从对立走向交涉：福建事变前后的西南与中央	罗 敏 / 35
中国国民党“党国”体制述评	江 沛 迟晓静 / 52
中国国民党改组派的政治路线及其现代意义	〔日〕山田辰雄 / 69
训政前期的党政关系（1928～1937） ——以中央政治会议为中心的探讨	刘维开 / 77
国防委员会的成立与运作（1933～1937）	王正华 / 95
从国民会议到国民参政会：职业代表制的 持续与变化	〔韩〕柳镛泰 / 113
从复兴社到三青团的组织演变	贾 维 / 130
1930 年代力行社眼中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 ——以《前途》杂志为例	徐有威 / 146
1930 年代中前期南京国民政府推行县政改革的原因及 主要内容	曹成建 / 160
战前中国的区乡行政：以江苏省为中心	王奇生 / 177
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的创设、演变及其知识背景	翁有为 / 193
抗战前夜中共中央战略决策的形成	金冲及 / 208
1930 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危机与新生	〔日〕田中仁 / 226

论吴玉章在海外的抗日宣传活动	吴达德 / 233
Wuhan Spring, 1938 : The International Propaganda Victory	〔美〕 Stephen MacKinnon (麦金农) / 250
汪伪政权与新民会	〔韩〕 裴京汉 / 263

二 一九三〇年代的中国经济

1930 年代中国的财政与财政官僚	〔日〕 久保亨 / 279
战前“统制经济”口号的提出及其实践	郑会欣 / 290
20 世纪 30 年代山西省的公营体系与国防经济建设	姜明喜 / 307
1935 年的汕头事件 ——1930 年代广东地方关税（专税）和日本	〔韩〕 姜玢亚 / 323
1930 年代乡村建设运动的农村改造模式	虞和平 / 338
抗战爆发后稳定法币的应变措施 ——对照档案看历史（1937 ~ 1939）	卓遵宏 / 354
源于实践之货币金融学真知 ——章乃器货币金融学术思想述论	李玉刚 / 370

下 卷

三 一九三〇年代的中国外交

日本外务省与 1933 年中的华北危局 ——以应对黄郛北上为中心	陈群元 / 391
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 ——抗战期间中日关系研究之三	杨天石 / 408
日本诱降汪精卫的政府自白 ——关于一份日本绝密文书的解读	臧运祜 / 425

抗战前期国民政府对日美关系的反应	鹿锡俊 / 444
抗战前期美国外交官对华政策的分歧	王纲领 / 461
抗战初期中国的对美“国民外交工作”	〔日〕土田哲夫 / 473
1935 ~ 1940 年英国对藏政策与中国西藏门珞察 地区边界危机	张永攀 / 487

四 一九三〇年代的中国军事

第五次反“围剿”中共军事政策再理解 ——以广昌战役为中心	黄道炫 / 505
论中国军队淞沪会战的战略意图	刘贵福 / 521
八路军平型关战斗再研究	杨奎松 / 534

五 一九三〇年代的中国文化

民国学界的老辈	桑 兵 / 555
“国难”与中国现代学术的成长 ——以《独立评论》为中心的考察	章 清 / 571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政治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	〔日〕水羽信男 / 591
20 世纪 30 年代教育领域里的自由知识分子与国民党之争 ...	张太原 / 603
胡适与 1934 年全国考铨会议	徐 飞 杨天宏 / 617
党治和法治：以罗隆基人权理论为视角	刘志强 / 631
1920 ~ 1930 年代国家主义派之内在文化理路	敖光旭 / 643
1930 年代《中华教育界》关于“中国教育现代化问题”的 讨论	田利军 / 658
1930 年代乡村教育派分之间的自发互动	曹天忠 / 673
社会史论战的先声 ——《新生命》杂志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探讨	贺 渊 / 687
Formation of Race and Racial Identity in China in the 1930s :	

- Eugenic and Scientific Racial Revival and the China-based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Debate Hsiao-peí Yen (阎晓培) / 704
- 聂耳——创作“新兴音乐”与1930年代的中国革命
..... [美] Joshua H. Howard (何稼书) / 720
- 1934 ~ 1937 年的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研究 汪朝光 / 737

六 一九三〇年代的中国社会

- 1928 ~ 1937 年《大公报》等报刊对中苏关系认识的演变 ... 陈廷湘 / 755
- 国民外交与学术研究：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基本活动及其
工作重心的转移（1925 ~ 1933） 张 静 / 771
- 1930 年代的佛教与政治：太虚法师和蒋介石 侯坤宏 / 787
- 民国中后期的政治与宗教：刘文辉与西康地区藏传佛教界
..... 王 川 / 804
- 1930 年代中国人之香港旅行：超越另一个境界线 [韩] 白永瑞 / 815
- 1931 年长江大水灾和湖南省的水灾救济
——以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与湖南省当局之间的
关系为中心 朴敬石 / 827
-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货展览会述论（1928 ~ 1937）
..... 马 敏 洪振强 / 839
- National Products and West Lake——1929 Xihu Exposition
..... Guannan Li (李冠南) / 855
- The Yangzi Meets the Amazon : Placing Peruvian Chinese
Nationalism in the 1930s——1929 Xihu Exposition
..... [美] Ana Maria Candela (甘安娜) / 864

一 一九三〇年代的中国政治



论蒋介石第二次下野与再起

金以林

在蒋介石一生的政治生涯中，曾经有过三次下野，都很快复出。第一次是在 1927 年宁汉对峙期间，第三次是在 1949 年国共决战期间。对这两次下野，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但对 1931 年的第二次下野，已有的研究成果不多^①。蒋氏这次下野，同前后两次最大的不同点是压力完全来自国民党内部。但仅仅六周后，蒋氏又重返中枢。党内各派势力特别是最高领导层内部，又经历了一番新的分化重组。本文主要依据台北国民党党史馆和“国史馆”现已公布的档案，重新梳理并说明这一看起来扑朔迷离的党内纠纷的来龙去脉，希望借蒋氏下野与再起这一个案，揭示国民党内权力重组、变迁的内在因素和各方相互争夺和妥协的真实心态。

一 蒋介石被逼下野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团结御侮的呼声，蒋介石一度动摇过同粤方的对抗，甚至表示要放弃内争，专心抗日。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的侵略，作为一国政府和军队的最高统帅，他是难以忍受的。11 月 7 日，宁粤上海和谈结束。12 日，南京四中全会首先举行。会议期间，蒋介石在一次干部会议上就曾表示：“余决心率师北上，与倭决战。对内则放弃选举竞争，诚意退让，期与粤方合作，一致对外。”当晚，蒋令负责同粤方谈判的宁方代表陈铭枢，赴上海邀请已从粤方分化出来的汪

^① 笔者曾利用报刊资料撰写《从蒋氏下野到蒋汪合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2 年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但该文几乎没有使用台北“国史馆”和国民党党史馆所藏核心档案。

精卫来京主持中央。^①

对蒋介石此举，汪精卫当然是欢迎的，但他也有一些难言之隐的顾虑。第二天，陈铭枢电蒋报告同汪会商结果：

钧座主张，汪先生极表同情。惟汪与哲生（孙科）有进退一致之成约，未便单独。顷汪已急电哲生，大意谓钧座见国难日亟，愿自任国防军总司令，即日出发，盼在汪、孙两人中请一人担任行政院长兼代主席云云，以征其同意。孙若同意，则汪先生依钧座意入京负责；孙不同意，则望以于右任先生代主席，汪个人可入京，并在可能范围内约粤方同志取一致。^②

此时，在上海的李石曾也积极同汪精卫联络。李多次致电吴稚晖、张静江报告汪之动态，其中一份电报说：“精卫兄今早来谈，意谓介公须俟妥洽后，若下野果能生效而后方可实行，万不宜冒然下野，既无益于妥协，反致益增纷扰。”^③

但蒋介石让出中央权力的举动，却遭到宁方内部几乎一致的反对。甚至连闲赋在沪的盟兄黄郛对此也深不以为然。11月18日，黄郛在日记中写道：

傍晚岳军（张群）来报告介石之新决定（让中央于汪，己则以国防军总司令名义出驻北平——原注），予深以为不妥。因此种形式等于对日宣战（最少亦可为谓对日备战——原注）。在此国联尚未绝望之时，似尚不可孤注一掷，举国以殉也。^④

11月20日，蒋介石再次召集干部洽商进退问题时，有如下一段有趣的对谈：

①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卷12（台北“国史馆”2004年），1931年11月17日，第352～352页。以下均简称《事略稿本》。

② 《陈铭枢致蒋介石巧午电》，1931年11月18日，《日寇侵略之部：貳、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3548。

③ 《李石曾致吴稚晖张静江电》，1931年11月28日，台北，党史馆藏“吴稚晖档案”，毛笔抄件，档案号“吴”字05897。

④ 《黄郛日记》第8册，1931年11月18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影印本。

吴敬恒曰：“精卫毫无诚意，徒为金蟾〔蝉〕脱壳之计耳。”陈铭枢愤然力争曰：“精卫必有诚意，当与合作也。”公（指蒋）曰：“过与不及皆未免错误。精卫生平固少诚意，但此次则不得不与合作耳。”吴老叹曰：“吾终以政治为不良之物也。”公则笑曰：“余终以人人为可信也。”^①

蒋介石此时的自信，是源自对自身实力和对汪精卫的深刻认识，特别是得到陈铭枢等人详细密报后，对粤方内部的分化，已成竹在胸。此时除汪外，孙科的态度也令蒋增添了不少信心。“哲生曾对其亲信说那一回（反蒋）彻底过，所不能遽然合作者，只关碍展堂（胡汉民）一人。缘展堂一月以来所持颇高，而汪等又不能不加以敷衍。此次粤四全之波折，实则汪、胡两派之争执。此后只要展堂不来或出外暂避，汪等即决赴南京。”^②一旦掌握住汪精卫和孙科，粤方所能带来的不确定因素，便大打折扣。11月22日，蒋在日记中充满希望地写道：“此次代表大会幸已告一段落，此为对内之一难关。今既平安渡过，增加余之奋斗勇气不少，益令人发生对党国无穷之希望也。”^③

但蒋介石面临的环境仍很险恶。东北被日军占领，使身负政府重责的蒋介石不能不受到民众的强烈责备；而在国民党内部，尽管粤方已有分化，但并没有彻底破裂；外患日急，又逼迫他必须尽快做出决定。24日，蒋再次召集熊式辉等人商谈“北上抗战”之策时，众人“皆坚持不可”，对蒋之“辞职下野，则赞否参半”^④。其实，蒋在内心中就是否下野，也仍在不停地斗争着。从以下两段日记中，多少可以读出蒋氏此刻的心态：

（11月24日）余决心北上与倭寇决战，虽无战胜之理，然可留民族人格与革命精神于千万世，且可引起太平洋之战争，而国家之复兴未必不在此。乃国人不谅，干部阻止，以为我不北上，可以避免倭寇之挑衅，而得苟安于一时。呜呼！……如果余下野之后国家能统

① 《事略稿本》卷12，1931年11月20日，第362～363页。

② 《上海贾秘书长设密艳三电》，1931年11月29日，台北，“国史馆”藏“阎锡山档案”微缩胶卷，21/0480。以下均简称“阎档”。

③ 《事略稿本》卷12，第393页。

④ 《事略稿本》卷12，第413页。

一，外交得胜利，则余之下野不失为革命者之立场。^①

(12月8日)此时主战，战必败，则以全国殉余一人之历史；如媾和，则余一人之历史，乃为全国而牺牲矣。又恐媾和以后，国民精神散漫，仍不能卧薪尝胆，则民族更形堕落也。^②

12月5日，粤方四全大会终于在广州闭幕。会后粤方决定先派孙科、伍朝枢、李文范、陈友仁四人赴上海，同宁方接洽合开四届一中全会事宜。而就在广州四全大会期间，汪精卫借粤方内部矛盾，暗中操纵汪派代表脱离粤方，借口共赴国难，又在上海召开了第三地的国民党四全大会，并抢在广州四全大会前选举出十名新的中央委员。尽管粤方否认汪派新选的中委资格，但此时尚未逼蒋下野，还不愿公开分裂。为此，粤方主动致电汪精卫报告粤方最新决定：“暂仍在粤成立中央党部。俟蒋中正实行下野解除兵柄，我方始北上，参加第四届中委第一次会议。”^③汪精卫得电后即将该电转发何应钦报蒋介石^④。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更想尽快将汪拉入宁方阵营，特派何应钦、邵力子赴沪，嘱其用“中正名义”，“促汪先生即速入京”^⑤。7日，汪精卫对陈铭枢表示：“粤会所举之执监委纵不来，亦可赴宁，但有先决两条件：一要拟具治国方案，经蒋承认；二要整个的合作，不应要此一部分，不要彼一部分。”^⑥

12月10日，粤方代表孙科等到沪，会同汪精卫、邹鲁与宁方代表陈铭枢会商。孙科首先声明，召开一中全会的前提是蒋介石必须下野，代理人选必须粤方同意。11日，陈铭枢致电蒋介石称：“胡汉民、孙科等必欲钧座辞职始快。职思当此时机，钧座似亦暂避为宜。”^⑦12日，蒋介石召集干部会商进退问题。吴稚晖、李石曾、戴季陶都反对蒋下野，表示：“介公必不可退。介公退，则中国休矣！”惟有何应钦表示：“真如之言亦

① 《困勉记》卷20，“蒋档”。

② 《困勉记》卷20，“蒋档”。

③ 《致汪鱼电》，1931年12月6日，中国青年军人社编《反蒋运动史》下（编者1934年印行，台北，李敖出版社，1991），第505页。

④ 《何应钦陈铭枢致蒋介石佳已电》，1931年12月9日，《日寇侵略之部：参、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档案号20014198。

⑤ 《蒋主席致张群十二月微电》，1931年12月5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⑥ 《上海煜如芷青现密阳电》，1931年12月7日，“阎档”微缩胶卷，21/0535-7。

⑦ 《陈铭枢致蒋介石电》，1931年12月11日，《事略稿本》卷12，第453页。

自有理。总座请细思之。”^① 对何应钦在关键时刻的表现，蒋是非常不满的。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

稚晖、石曾、季陶、铁城皆不主余退，而敬之（何应钦）、真如等则惟恐余退之不速也。……此时救国，惟有余不退之一法。但欲余不退，惟有改为军事时期，一切政治皆受军事支配，而听命于余一人，则国始得救。否则，如今日情形，群言庞杂，主张不一，彼此互相牵制，不许余主持一切，而欲以无责任、无意识、无政府之心理，利用领袖为傀儡，则国必愈乱。余之身败名裂、个人牺牲固不足论，但余虽牺牲亦不能救国之危亡。呜呼！天下事之至惨，未有如今日之甚也。^②

此时，蒋介石深知欲“改为军事时期”，“听命余一人”，是无法做到的，局势又不许可长期僵持，自己如再不下野，上海和谈达成的四中全会后宁粤双方合开一中全会的协议便不可能实现。在各方面压力下，作为权宜之计，蒋介石被迫于12月15日宣布下野。至此，粤方要求如愿以偿。

但蒋介石的实力和影响仍在。为了减少今后复出时的障碍，蒋预先作了周密布置。他在辞职当日早8时首先召开第49次国务会议，一举改组四个省政府，分别任命顾祝同、鲁涤平、熊式辉、邵力子为江苏、浙江、江西、甘肃省府主席，贺耀组兼甘宁青宣慰使^③。会后10时才赴中常会提出辞呈^④。这一举措明显是为了对抗粤方削弱蒋氏军权的企图，也为自己再起埋下种种伏笔。

二 四届一中全会的纠纷

12月16日，当粤方得知蒋介石宣布辞职后，立即派李宗仁、马超俊等分两批自广州赴南京。宁粤双方终于能够在南京合开四届一中全会。

随着粤方代表的入京，一个新矛盾又呈现出来。大会召开前，对汪派在上海“大世界”游乐场召开的第三地国民党四中全会所选的十名中央委

^① 《事略稿本》卷12，第457页。

^② 《困勉记》卷20，“蒋档”。

^③ 1931年12月16日南京《中央日报》，第1张第4版。

^④ 《事略稿本》卷12，第460页。

员资格问题，出现较大分歧。因粤方不承认汪派中委，对此，汪精卫信誓旦旦地表示：无论如何，“我们对于本会代表在上海选举的结果，一定是尽力维持的。”^①

对于汪精卫同粤方的分歧，蒋介石自然求之不得，并乘此极力拉汪投入南京阵营。16日，已下野的蒋介石召开中常会临时会议。在讨论出席四届一中全会委员问题时，陈立夫提到汪派“大世界（指汪派四全大会选出的十名中央委员）的怎样？”蒋即表示：“大世界的也要来的。如发通告，笼统一点。大世界的名字可以不写。”^②18日，刚刚入京的汪派骨干陈璧君、顾孟余、陈公博即来拜见蒋介石，请蒋“助其解决上海大世界十委员问题”，并表示惟“先承诺”此点，“精卫然后乃肯来京”。蒋对此“毅然允之”。^③

12月22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终于在南京开幕。蒋介石出席开幕式后，留函孙科表示：“全会即开，弟责既完，如再不行，必为本党之梗。故决还乡归田，还我自由。”^④表面上，蒋做出一副解甲归田的姿态，暗中更加紧了联汪制粤的步伐。蒋在离京前特意召见陈公博、顾孟余、王法勤谈话，“大意谓本党现值存亡危急之际，急须一得各方信仰之领袖主持一切。本人甚盼汪先生能不顾一切，任此艰巨。……中兴本党非汪莫属。”^⑤

当日下午，一中全会召开预备会议。宁粤双方首先对汪派中委资格发生激烈争论。接受汪派中委，是蒋介石的既定方针，宁方自然表示赞同。石瑛首先主张汪派中委应予出席，引起粤方的反对。吴稚晖则以中立者的姿态说：“这件事本来与我们是不相干的。……粤方既多九人，势难取消，不如依何委员应钦所提议听京方亦增九人。此十八人……定名为次候补”，“大家以为这个办法可以实行，在南京方面褚委员（民谊）和本席愿意改为次候补委员。”原本支持粤方的林森也表示愿意改为次候补委员。随后石英、陈璧君、马超俊等纷纷附议。^⑥最后，由主席团提出折衷方案，沪

① 《反蒋运动史》，第503页。

②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常务会议速记录》，1931年12月16日（台北，党史馆藏，毛笔原件），档案号00.1/126。

③ 《事略稿本》卷12，第467页。

④ 《蒋委员遽鸣高蹈》，1931年12月23日上海《民国日报》，第1张第4版。

⑤ 《会后蒋返奉化》，《国闻周报》第9卷第1期，1932年1月1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要》，第7页。

⑥ 《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第一次预备会议速记录》，1931年12月22日（台北，党史馆藏，毛笔原件），4.2/52。

选十名中委除张发奎由粤方同时选出外，其余九人全部承认，另增加中委九人，京方得五名，粤方得四名^①。会议才得以继续进行。

一中全会，共通过各类提案 39 件，其中最重要的是上海和谈期间粤方提出的《中央政制改革案》。该案由粤方代表伍朝枢起草。伍氏在第一天会议上首先向全体代表解释道：

本案的理由很简单，第一项我们想把以后的国家元首在政治上处于超然的地位，不受政潮的牵动。这是与中国的情形比较适宜，否则如这几天的情形，就可以看出来元首的更动几乎使国家陷于无政府状态。所以为避免这种流弊起见，“国民政府主席不负政治责任，不兼其他公职”，其资格就定为“以年满六十岁，众望素孚者充之”。又为维持其地位的超然，规定“任期二年，得连任一次”。……在元首之下，由五院各自独立行使职权。元首好似立宪国家的总统，行政院长就等于立宪国家责任内阁的国务总理。^②

粤方的《中央政制改革案》，就是希望从制度层面限制蒋介石垄断政权。对此，吴稚晖首先反对，他说：“本席以为上海和会的决议应该尊重……南京方面的四中全会曾决定原则接受，但对于过去法令及约法有抵触者不能接受。”吴氏的发言立即引来粤方的激烈反驳。李烈钧坚持“应拿上海和会的决议作基础”；邹鲁称：“和会决议或不免与各方面的法律有抵触，但现在我们只能处处从共同方面着想，尤应注意的就是不要使和会决议发生摇动，否则散漫无归，一定得不到结果。”^③

由于粤方坚持捍卫上海和会决议，宁方被迫放弃。但宁方又将攻击矛头转向国家元首的年龄问题上。尽管粤方一度表示退让，将国家元首年龄限制由 60 岁降到 50 岁，但宁方仍不依不饶。张道藩首先质疑粤方制定年龄限制的理由，他说：“年龄的规定应有一定的标准，若昨天定六十岁，今天定五十岁，或者明年定七十岁，后年定八十岁，那么其限定的理由是

① 《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第二次预备会议速记录》，1931 年 12 月 23 日（台北，党史馆藏，毛笔原件），4. 2/52。

② 《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第一次会议速记录》，1931 年 12 月 24 日（台北，党史馆藏，毛笔原件），4. 2/52。

③ 《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第一次会议速记录》，1931 年 12 月 24 日（台北，党史馆藏，毛笔原件），4. 2/52。